

【论 文】

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马戎

摘要：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我国建国初期系统接受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以苏联为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一些实际问题。为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解放思想，拓展视野，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努力推动符合中国最新发展国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一、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出现的两位伟人

20 世纪的中国先后出了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所生活的岁月都是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危机和历史性选择的年代，在它们为中国共产党掌舵的时刻，这两位伟人都及时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使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时刻得以克服危机，走出困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 20 世纪的前 50 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排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错误干扰，克服了党内“左倾”、“右倾”错误路线，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决策和发展战略，取得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胜利，创建了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永远走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状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站立起来。

在 20 世纪的后 50 年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另一个危急的历史关头。正是在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下，党中央在“文革”后从根本上扭转了“左倾”意识形态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使生产、经贸、交通、科教、外交等各项工作转入正轨，通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通过“一国两制”的创新性制度安排，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

这两位伟人，一位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建国伟业；一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变迁日趋复杂的历史时刻，缅怀这两位中国的世纪伟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刻理解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并在历史重要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实，证明了他们当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和赞同他们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特别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与政治形势时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科学精神，简单地说，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党内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以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为楷模，强制推行一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主张，批评毛泽东同志，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同志则坚持深入农村，开展大量的实地社会调查，不怕当时的领导人给他扣的“意识形态”帽子，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理念批评

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由于事实证明了他所持主张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根据中国国情所制定的革命战略逐步得到全党的支持，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国的胜利。毛主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到“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所以在延安时期把它作为“抗大”的校训正式提出来。

在“文革”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可有些人却还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意识形态”帽子来反对党中央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提出了“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则针锋相对地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就是在新形势下捍卫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如果没有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文化革命”的左倾路线是完全无法纠正的，任何基于“实事求是”精神而提出来的各项工作规划也是无法推动实施的。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同时也只有真正解放思想，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才能实践“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亲身体验和了解西方国家的发展态势，在立足本国国情和放眼世界的基础上对原来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提出了质疑。那时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排除了以“意识形态”为旗帜的种种干扰，制定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和政策。重新思考了当年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毅然在全国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改变了我国农业几十年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之后，对于党内关于沿海经济特区“姓资”和“姓社”的争议，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不讨论”，因为当时这些改革措施与新制度的实际效果还看不大清楚，争论不出结果，小平同志认为只要方向看准了，就先干起来，有了效果之后，在事实面前，真理不辩自明。这正体现出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领导人的英明之处和决断的魄力。当年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不会出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放，不会有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不会出现股份制企业，也不会出现今天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繁荣局面；不实行对外开放，也不会出现出国留学和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科技文化经济全面交流的积极进取态势。

“一国两制”是中国近年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如果从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看，肯定会被认为是“投降主义”和“卖国”，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这是最稳妥可行的安排。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放眼世界，才能在思想上得到解放，不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所束缚，才能在制度、政策方面提出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创新思路和创新措施。

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

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事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从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教导与革命实践中深刻理解这两位伟人思想的精髓，要时刻关注客观世界的变化，注重社会调查。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发展现实与马列主义经典著述中的民族理论之间存在差别和距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体制在实施后开始显现出一些负面作用时，就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和理论反思，在民族理论上尝试着提出新视角、新思路、新概念、新理论，在横向和纵向的制度对比中尝试着剖析现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探讨制度创新的新方向。没有创新意识的研究工作，也就没有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学术研究，不会有理论的发展。而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的发展，也就无法推动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世界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中国社会也在前进和变化，21世纪的世界已不再是马列主义

创始人当年面对的世界了，帝国主义没有像列宁预计的那样走向腐朽与没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共产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 50 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情景了。

必须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民族政策的执行者和执行的对象，已不再是 50 年前这些制度与政策设计与制定时的执行者和执行对象了，自那时以来，已有两代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在解放后不久，亿万各族贫苦农民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无偿分到了土地，摆脱了原来的高利贷，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使他们翻身解放的共产党政权；而那时在我党的基层干部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素质、认真和有原则性的政策水平、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也很普遍。50 年代中国的社会风气及党和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场景中产生的。而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各族青年民众、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和与 50 年前的情况相比，在经历了这些年的社会运动和变迁之后，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政府工作的主线，法治和反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公正、公平、个人权利和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既然世界形势和具体国情发生了多次重大变迁，在过去的年代和社会场景中曾经一度是正确东西，也可能就会因为脱离实际而成为阻碍人们去客观和科学认识新事物的障碍。毛主席一生中曾经做出过许多正确的重大决定，但同时在他的晚年也犯有不少错误，如果对领袖人物的理论和功过评价方面缺乏辩证法，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就会成为毛泽东同志早年批判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否认历史的发展，否认社会的变化，否认人的认识必须跟上社会的变化，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基本概念，以苏联为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而且直至今日我国在民族理论、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大致还是沿袭着前苏联的传统。从基本概念、理论架构、分析思路、使用术语等方面都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我们扪心自问，今天我国大学里有关民族理论的教科书和有关民族问题的政府文件，与 50 年代相比，可曾对近半个世纪里世界局势和民族问题的新动态做出过新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分析吗？在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理论架构、分析思路方面可曾提出过什么真正带有创新性的东西吗？

这些 50 年代从苏联承袭来的制度和政策在中国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十分幸运的是，至今为止总的来说还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斯大林指导下形成的前苏联基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民族关系等等在今天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斯大林的理论（包括他的民族理论）以及他和后来苏联领导人在各方面的实践都已经被置于需要重新认识和彻底反思的位置上了，斯大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政治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神圣光环已经黯然退色，他的历史功过将会被重新评价。而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改变几十年来把斯大林民族理论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经典的观念，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需要根据苏联 70 年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来重新分析和思考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同时也要根据新中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重新分析和思考当年参照斯大林民族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半个世纪里，苏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各个方面的理论、制度和政策自然也就需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我们认识上的提高而进行必要的变动和调整。

以国内情况来说，20 世纪 50 年代在城市里“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公私合营和国有化，在农村推动“合作化运动”和全面组建人民公社。对于这些制度和政策，今天人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又推动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在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同时在新政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合资



企业和外资企业也使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新的政策指导下蓬勃发展起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制造的商品开始销往全世界，成了“世界的工厂”。

这半个多世纪里先后发生的这些制度变迁和推行的新政策必然会影响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际关系。因此，在这一重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及时地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的实际情况，了解各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干部、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和真实想法，回答人们在新的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惑。现在国家机关、各地政府也在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各类专题的实地调查活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调查活动中是否在思想上能够不带框框、是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面对和分析新的社会事实时能否真正解放思想，是我们认识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发展规律的关键。

三、我国民族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中国和世界形势变化很快，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民族研究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大致沿袭了 50 年代以来的传统，导致目前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有些研究者在思考民族问题时仍然有政治上的顾虑。“民族宗教无小事”，看到过去有些人曾在民族问题上犯过政治错误，依然心有余悸，认为无论如何现行的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中央制定的，是有中央文件为依据的，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肯定过的，即使将来有什么问题，也自有上级领导同志承担责任，自己总是安全的；而如果自己出来质疑这些理论和政策，就有犯政治错误的风险，毁掉个人的前途，所以不敢提出新思路。从个人得失的角度考虑，这样确实是很实际的理性选择。但是如果真正考虑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站到 13 亿各族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也就不算什么了。况且现在的政治形势毕竟不同于“反右”和“文革”时的情况，研究者实在不必有太大的顾虑。其实仔细想想，在 50 年代所制定的政策中、在 50 年代开始推行的制度中，有许多都已经由党中央自己进行了调整和改变，其中最重大的调整和改变就是由小平同志亲自做出的，而且后来的社会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些在当时备受争议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腾飞。

二是有一些民族理论领域的学者基本上是坐在书斋里读经典，言必称马列，在文件和首长讲话中找根据，在术语和逻辑中做推论，很少迈开双腿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系统和深入的社会调查，看看在新世纪里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很少与基层普通民众交朋友，很少真正倾听基层各族民众根据切身体验而对我国目前各项制度和政策提出的看法。要知道正是来自民众中的这些朴素话语和生动案例能够为我们思考民族理论和政策提供最鲜活的基于社会事实的营养，民众和基层干部的有些话，对一些问题的症结讲得“一针见血”。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在思想上不带任何框框，虚心倾听民众反映出来的最朴实思想和观点，有助于把握社会变迁的脉搏，提炼出社会发展的轨迹，最后上升到理论层面。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里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1941：747），对于民族研究者来说，就是要“调查各地区各民族的生动情况”。他在批评那些只知读书、脱离民众实际生活的理论家们时说，（这些同志）“他们忘记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要吃饭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当我们这些久居于大学校园里的研究者们渐渐忘记了这些基本事实时，基层民众是可以提醒我们的，但我们需要深入到他们当中去，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反映和意见。

三是我们的某些思想禁锢还没有完全突破，眼界还没有真正打开，思想还缺少有力的装备，研究还缺少恰当的工具，在思路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建国后几十年思想定式的束缚，无论是思考中国几千年的民族关系史，了解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民族理论与实践，还是了解其他发展中



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在这些方面信息的获取与思考是十分欠缺和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对这方面不够重视，甚至我们还很容易对接触到的有限信息和研究成果以意识形态不同或“不符合国情”为理由而简单地加以否定，或以“与中央文件精神不一致”为理由武断地封杀不同观点的发表。

必须承认，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民族研究领域的对外交流方面目前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领域，这样一种局面在客观上十分不利于我们学习国外社会科学的新的研究方法，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与充分借鉴国外学者在民族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束缚住我们的头脑和思维，限定了研究视野，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很难做出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这也是造成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相对滞后局面的原因之一。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政策领域的重大突破都取决于学术研究的进展。

四、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需要广开言路、百花齐放

如果对比国内大学其他几个学科在改革前后课程内容的不同，我们会鲜明地感觉到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民族研究领域的相对滞后。

首先来看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各大学所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阅读的是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新的内容也不外是斯大林时代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等。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学里教授的经济学课程中，以研究市场经济实际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逐渐占据了主体的地位。

再看其他几个学科，过去中国大学里的政治课和法学研究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在内容上和今天中国政治学、法学所研究的民主机制、选举制度、保障人权和私有财产的制度与法律安排等相比，差别已经非常大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学往往以农民起义为主线来诠释以往的历史，而今天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无疑有了极大的拓展，同时也走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单线进化论的框架，开始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据史实来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在1952年被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帽子的社会学、政治学在70年代后期得以重新恢复，在当今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调查与讨论中也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学科。在这些学科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各种不同观点和学说可以共同讨论与相互争辩，很少发生对不同学术观点戴政治帽子加以批判的现象，呈现出“兼容并包”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自由空气和科学氛围。

与以上这几个学科相比，可以说我们民族研究的教科书无论在理论体系还是课程内容上大致保持着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否认世界格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不否认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不否认其他学科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在其学科的基本框架、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专题上所做出的重大调整，我们就应当承认民族研究领域在学科发展方面是明显地落后于其他学科了。要想缩小这一差距，关键就在于要大力提倡和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把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研究真正看作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为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成果，学术研究不应当有“禁区”，对于一些国内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反思，需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交流、坚持科学态度、以理服人的学术氛围，从而真正推动各种观念的交流和争论。在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和科学求实的讨论氛围才会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西方学者或多或少地从意识形态的“冷战”立场出发，在他们的调查与研究中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变化，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带有明显的偏见。有些西方国家的基金会热衷于支持在中国调查与研究“民主运动”、“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中产阶级”、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等与西方意识形态密切联系的专题。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应否认，在西方学术界也还有一些比较客观、立场中立的学者，其中有些人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多次来中国开展实地调查，能够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报道、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存在的问题，有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有正面的评价。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向西方社会民众介绍中国实情的宝贵渠道，而他们在美国种族问题、苏联解体问题、印度“民族建构”问题、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问题、非洲部族社会、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等专题方面所做出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也值得我们了解与借鉴。我们并不需要“全盘接受”他们的立场与观点，但是他们对研究文献的梳理、他们提出的研究命题和分析问题的研究视角，都可供我们参考。

马列主义无疑始终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我们不应把马列主义看作是僵化的教条，应当认识到作为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马列主义是汇集了当时人类社会在各领域所获得一切知识的结晶，是在对当时社会变迁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对当时各种思想流派、学术观点的分析与批判性继承中诞生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观点都是在“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科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一些打着“正统马列主义”旗号的研究者也可能会走到事物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1930）。

我们今天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要想真正继承马列主义的科学精神、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列主义，就必须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需要广泛参考世界各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我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决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只要真正为各族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着想，有了这三条前提，我们就应当广开言路、积极鼓励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开拓视野和进行理论创新。“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1944：905）。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追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不当给任何人戴政治帽子，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领域，应当逐步造成大家平等讨论，各抒己见，相互尊重的氛围，都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来倾听不同的观点，如果不能说服对方，各自都可以长期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等待社会发展的实践的检验。

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方面所做出的正确决策才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小平同志一直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我们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学者，需要真正解放思想，打消顾虑，拓展视野，深入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我们的实际工作来实践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努力进行符合中国最新发展国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

（本文将正式发表在《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参考书目：

毛泽东，1930，《反对本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

毛泽东，1941，“《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47-752页。

毛泽东，1944，“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05-906页。

邓小平，1982，“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11页。

